

【新闻与传播】

# 结构张力与情境诱发：网络谣言的生成及其治理\*

张广利 赵时雨 王伯承

**摘要：**网络谣言作为舆论的一种特殊形态，并非偶然性的虚假信息流瀑，而是社会架构更迭中结构性张力的聚合与呈现。在社会学视野下，我国转型期语境下的网络谣言蕴含着“结构张力—情境诱发”的生成机理：风险社会境遇中的网络谣言，充当着个别人满足脱域性团结需求、缓释焦虑情感的工具；信息交互不畅态势下的网络谣言，扮演着实现畸形化信息突围的社会公器；利益张力格局中的网络谣言，充当着释放消极社会心态的重要出口；网络意识形态紊乱情形下的网络谣言，本质是民粹思维驱动下的极端行为展演；“文化堕距”状态下的网络谣言，是由直观化经验主义惯习勾勒的日常思维图景。消减网络谣言负面效应、维护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需要从善治思维起步，搭建面向网络谣言的国家与社会治理桥梁，将国家、社会、个体间的张力结构串联为协作默契的有机系统。

**关键词：**网络谣言；结构紧张；生成机理；社会治理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22)04-0161-08

在新时代，网络谣言治理不但关乎网络秩序稳定，更指涉国家安全与发展战略的宏大结构。互联网已经成为舆论斗争的主战场，在互联网这个战场上，我们能否顶得住、打得赢，直接关系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和政权安全。<sup>①</sup>然而，当前网络场域中的谣言往往未能在制度性实践、技术性介入下迅速消散。突发公共事件发生后，冗杂的网络谣言时常得到大规模扩散。网络谣言何以经久不息？如何更有效地治理网络谣言？这些问题皆待进一步探讨。

## 一、概念界定与文献回顾

### 1. 网络谣言与结构紧张

谣言是人类历史实践中经久沉淀的社会图像，孔飞力笔下的“叫魂”便是谣言于传统时期的生动写照。随着信息时代到临，去中心化、脱域化的网络

场域不断穿透时间、空间边界，为谣言的生成注入了额外的不确定性变量，以至于网络谣言不时构成扰乱社会秩序的风险因素。

在此情形下，对网络谣言的研究日渐增多，但“谣言”“传言”“流言”等概念的混用也广泛存在。我国语境中的“谣言”，往往被视作一种充斥蓄意动机、消解社会稳定的“病症”<sup>②</sup>，并被置入风险防治框架之中<sup>③</sup>。西方语境中的“传言”或“流言”(rumor)，则更富有中立意涵。如卡普费雷认为“传言”是未经官方证实或已被辟谣的信息，并将其看作一种“反权力”的大众传媒工具。<sup>④</sup>

显然，“谣言”“流言”在概念内涵上，存在着“是否存在刻意动机、信息是否真实”的差异。然而，网络场域中“谣言”“传言”的参与主体数量甚为庞大，并时常随事态走势迅速延展互动边界，因此最初的

收稿日期：2021-10-15

\*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特大城市社会风险系统治理研究”(16ZDA083)；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城市更新中的社会风险再生产与韧性治理研究”(21BSH041)。

作者简介：张广利，男，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社会学博士(上海 200237)。

赵时雨，男，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生(上海 200237)。

王伯承，男，上海海事大学马克思主义海洋文明与中国道路研究中心讲师、硕士生导师，社会学博士(上海 201306)。

动机无法准确界定。一些情况下,有的信息虽未完全偏离真相,但在传播过程中异化为谣言。<sup>⑤</sup>可见,以信息真伪、动机来分辨“谣言”“传言”等概念,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有鉴于“谣言”在国内语境中有被泛用的可能,本文将网络中的“谣言”“传言”“流言”统称作“网络谣言”。此外,基于价值中立原则,在综合考量上述概念内涵的基础上,本文将“网络谣言”定义为,网络主体间交互传递的、偏离事实真相的不确切舆论信息。

在我国当前舆论环境中,网络谣言频频伴生于社会事件之侧,扰动社会秩序的安定。该现象并非仅仅源于信息主体的认知偏差,还关涉社会架构迅猛更迭下的结构紧张。所谓结构紧张,即伴随着社会变迁的结构性调整与创新而产生的不同部门、行业、地域间的不协调与摩擦,这是一个社会在发生变迁时所面临的不可避免的状态。<sup>⑥</sup>

在结构紧张视野中,网络谣言在一定程度上充当着映射深层次结构性社会矛盾的舆论表征。我国现阶段的结构紧张源于两个维度的因素:其一,迅疾转型下的高昂成本。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多重制度转轨下取得了丰硕的发展成果。而“压缩饼干”式的社会变革<sup>⑦</sup>也带来了诸多维度的社会分化,甚至是社会动态结构链条的断裂。与此同时,新的结构整合机制发育缓慢,“社会分化与整合的不同步”构成了当前发展的基本矛盾。其二,多重矛盾的共时性激活。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主要矛盾,分别由财富分配下的“我饿”与风险分配下的“我怕”所主导。然而在中国社会转型与全球化趋势的合力驱动下,财富分配与风险分配这一对历时性逻辑,正共时性地并行于中国社会中。在“我饿”与“我怕”的叠合下,财富分化、社会原子化等矛盾一同绘制着我国的结构紧张图景。

作为结构紧张的结果,部分社会主体间的利益矛盾、紧张关系日益凸显。比如“郭美美事件”曾一度引发网民对于个别官员作为、社会资源分配的强烈质疑,网络舆论场域逐渐成为积攒结构性社会矛盾的蓄水池。网络谣言作为社会舆论的特殊形态,同样并非偶然性的虚假信息流瀑,而是我国结构紧张的聚合与呈现。如果说突发公共事件等外部因素如同一颗击破蓄水池静态水面的石子,网络谣言便是那层层涌起的涟漪。

## 2. 文献综述与研究理路

有关网络谣言的研究成果已有很多,但鲜有学者以结构紧张这一综合性视域研判网络谣言。从结构紧张的视角审视网络谣言,较之过往研究体现了三个维度的不同之处。

第一,能够更为准确地进行谣言归类。当前学界往往以动机、后果区分不同谣言<sup>⑧</sup>,侧重于捕捉谣言的某一特质,可能陷入一叶障目的逻辑窘境。结构紧张视野中,网络谣言离不开诸多结构性矛盾的型构,基于不同社会矛盾的谣言划分,能够具备较好的准确性。

第二,得以深层次地探访谣言生成逻辑。有关谣言生成的研究,时常借助定量技术来把握谣言演化时序的纵向时间轴,抑或通过跟踪谣言扩散路径的横向社会空间轴<sup>⑨</sup>,深究其形成过程中的主体、受众、媒介等要素。这些分析虽足以抓取谣言产生的踪迹,却局限于“就事论事”地论证谣言自身的形成因由。在结构紧张视域下,网络谣言的复杂面相由诸多结构性矛盾所勾勒,由此能够挖掘谣言背后的深刻社会原因。

第三,能够从根源上形成应对网络谣言的治理构想。既有谣言治理研究一般是以数字建模追踪谣言、以建构预警体系防范谣言<sup>⑩</sup>以及借助行政手段控制谣言或辟谣<sup>⑪</sup>。诚然,此类举措具备一定的积极功用,但它们不热衷于探究问题的本源性因由,谣言治理便流为无根之木。将谣言置入结构紧张的分析框架,能够通过观测其交互勾连的结构性矛盾,釜底抽薪地搜寻到谣言治理路径。

总的来看,结构紧张与网络谣言之间呈现了一定的逻辑亲和性。因此,本文基于结构紧张的分析视角,选取近年来争议性事件或突发事件中的网络谣言展开论述。研究理路则呈现以下几个层次:通过抓取不同类型网络谣言的特质、属性,予以科学、确切的理想类型区分;从不同网络谣言的社会表征出发,挖掘其中结构紧张的深层样态,以及情境勾连下的谣言泛起机制;将网络谣言置于善治的国家社会协作治理模式中,探访强化网络治理效能、增强网民主体效用的实践路径。

## 二、结构张力与情境诱发:网络谣言的多重生成逻辑

结构紧张构成了网络谣言产生的社会土壤,但不等同于结构紧张直接诱发谣言,两者间仍存在一

定的情境诱发机制。纵观社会学理论的发展,诸多行动理论都关注“情境”这一塑造行动的核心变量。正如布迪厄之场域论、吉登斯之结构化论、霍曼斯之交换论等理论所强调的那样,场域、规则与场景刺激等情境变量,皆是形塑行动者行为策略的要素。解析网络谣言时,同样需要将其置入涵盖利益、权利、文化的综合性框架内,感触不同主体的日常情感体验,捕捉谣言产生时的情境要素。在此基础上,网络谣言的生成机理具体呈现为“结构张力—情境诱发”的逻辑图式,并可划分为“个体恐慌共享型”“挑战权威话语型”“官方形象污化型”“政治阴谋论型”“经验定式直推型”五种理想类型。在由不同维度结构性张力所塑造的话语情境中,网络谣言在被一些网民作为传播不实信息工具的同时,存在着异变为失范性舆论展演的风险。

值得注意的是,五种谣言类型彼此间并不是边界全然明晰的互斥关系,而是存在一定的交织。这正是由于社会结构紧张自身便是不同利益格局、社会关系间犬牙交错的张力呈现,而且不同领域结构紧张之间也发生着交合与重叠,由其催生的不同类型网络谣言同样存在一定程度的交互渗透。正如“个体恐慌共享型”“经验定式直推型”网络谣言的生成逻辑,同样可能参与其他类型谣言的型构。

1.“个体恐慌共享型”网络谣言:风险社会焦虑与焦虑团结需求

“个体恐慌共享型”网络谣言,即通过夸大事件真相以营造焦虑氛围的不确切网络信息。此类谣言主要伴生于突发公共事件发生后的风险情境中,如“郭某鹏”相关谣言<sup>⑫</sup>便属于该类别。结构紧张视角下,该类谣言的生成逻辑呈现为“风险社会焦虑—焦虑团结需求”。

风险社会引致的多维度社会焦虑,构成了生产网络谣言的现实基础。从社会环境维度看,自然、社会环境“人化”程度的提高,使得人类已经生活在“文明的火山”上,社会成员承受着公共卫生事件等诸多不确定性威胁。从风险分配维度看,现代风险作为“民主的烟雾”<sup>⑬</sup>,突破了阶层壁垒,扁平化地分布于社会各个角落,正如突发事件中民众、精英皆未能幸免于难。从风险承受维度看,现代分工引致了解构传统共同体的原子化浪潮。在风险社会中,社会恐慌与焦虑成为本体性安全缺失下人类社会心态的普遍化表征。<sup>⑭</sup>

在这一背景下,如何选取有效路径以应对风险、消减焦虑,自然成为公众的理性选项。贝克曾认为,现代风险的对应物并非只有个体的痛苦,焦虑型团结成为风险社会中的共同需求<sup>⑮</sup>,而网络谣言便时常扮演着人们营造社会团结、缓释焦虑的社会公器。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生后的风险情境中,“郭某鹏密切接触数万人”等“个体恐慌共享型”网络谣言的大规模扩散便是例证。为抵抗风险,原子化个体往往积极共享生活经验与情感体验。他们在脱域性信息互动的默契共情与交互抚慰下,形成信任感与秩序感,以“线上集体欢腾”<sup>⑯</sup>的形式达致涂尔干意义上的社会团结,营建起提供社会支持的“风险共同体”。从一定程度上讲,这种团结感与信任感,与吉登斯所言的“日常实践默契构成人类本体性安全基础”<sup>⑰</sup>的论断不谋而合。该类型谣言的广泛扩散,正是因为其缓释焦虑情感的积极效用。

2.“挑战权威话语型”网络谣言:信息交互不畅与畸化信息突围

“挑战权威话语型”网络谣言,即质疑官方权威论断的不确切网络信息。此类谣言一般发生于争议性案件话题中,如“成都49中坠亡案”<sup>⑱</sup>相关谣言便属于该类别。结构紧张视野下,该类型谣言的内在机理表现为“信息交互不畅—畸化信息突围”。

部分地域、领域中国家与社会间的信息沟通不畅,构成了产生网络谣言的内部动机。这主要呈现在两个维度:其一,在个别争议性公共事件中,自上而下的信息下沉不畅。在网络动员频繁诱发集群行为的现实背景下,甄别、遮蔽线上信息,成为一些地方政府组织达成“维稳”目标的重要治理手段。正如个别公共事件中,基层治理者为维持舆论秩序稳定,未能全面、及时公开信息以还原真相,可能激发民众的“信息饥渴”与深度质疑。其二,局部领域自下而上的诉求传递不畅。一些领域、地区的信访或网络问政等权益表达渠道,可能囿于基层治理者的推诿、拖延,无法有效传递民生需求。个别民众甚至不惜铤而走险,以成本高昂的“闹大”做法来实现博弈空间的增量。在此背景下,一些网民可能以非制度化方式争取话语权,在争议性事件发生后建构所谓的真相、讨要所谓的说法。

在此客观环境中,网络谣言有时会充当起个别网民获取稀缺信息、表达特定诉求的工具。其一,网络谣言扮演着孔飞力笔下“稀缺社会的武器”<sup>⑲</sup>。

在由争议性社会事件所塑造的话语情境中,当官方信息与民众期待相左或真相未明之时,部分网民就可能通过既有经验材料的支撑、过往刻板印象的注入,臆造出未经考证的信息以颠覆官方的权威说法,从而在“有组织的不负责任”及“专家系统”的话语界限中,达成“信息突围”的希冀。正如“成都 49 中坠亡案”中,一些网民通过转发、臆测“林某坠亡真相”“学校不当举措”的不确切论断,在网络话语格局中实现与官方权威机构、媒介的抗争。其二,较之信访等制度化手段,以隐匿性网络实践来表达诉求显得更为便捷。网络舆论如今愈发成为民意表达的“最大出口”<sup>②0</sup>。现实热点问题引起网民关注时,不但可能吸纳公众对于“掩盖真相”式行为的广泛关注,也在一定程度上倒逼地方权力部门详尽、及时公开调查结果,促进民众与政府组织间的信息对称。

### 3.“官方形象污化型”网络谣言:利益结构张力与负面心态释放

“官方形象污化型”网络谣言,指的是基于对国家、政府的刻板印象而传播的不实信息,此类谣言时常产生于利益分配话题中,如“苟晶案”<sup>②1</sup>“外国人永久居留条例”<sup>②2</sup>相关谣言便属于这一类型。在结构紧张视野下,上述两个案例实则共享着“利益结构张力—负面心态释放”的生发机制。

此类型网络谣言的生发逻辑,与社会存在的结构性利益矛盾密切相关。“更加突出的问题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这已经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sup>②3</sup>在社会学视野下,资源分布不均存在着诱发负面社会心态的可能。如马克思、达仁道夫、韦伯分别通过“利益相对剥夺”“权威地位分化”<sup>②4</sup>以及“非常态的资源流动”<sup>②5</sup>,论证了“利益结构矛盾—相对剥夺感”的相关关系。现阶段结构性利益矛盾引致的负面心态主要呈现在两个维度:其一,利益分配方式引发的弱势群体消极心态。在制度变革中,部分弱势群体面临着阶层流动艰难、社会保障“兜底”有限的生存发展窘境,这种状况引发的相对剥夺感,可能深化为针对精英或国家的对抗心态。<sup>②6</sup>其二,特定情况下对外国人的差异化待遇激发了个别民众的怨怼情绪。在“山东大学学伴事件”等话题中,一些民众对于面向“国民与旅华外国人”的差异化政策有所误解且颇有微词。在国内局部地域、领域竞争机会不均等的基础上,这种国别间的差异化待遇,会增大部分民众的愤懑情

绪与消极心态。

在利益结构张力的环境中,网络舆论充当着统合利益诉求、消极情绪的社会工具。当日常生活世界中缺乏整体性情绪凝结手段抑或制度化意见整合通道时,信息平台可能成为凝合碎片化情感与诉求的替代场域。在伴生于利益分配问题的话语情境中,部分网民可能将宣泄性、诉求性话语杂糅为失实的污名言论,以高度同质化话语的形式啸聚于网络场域。他们甚至可能罔顾历史因素与个体情况,认定国家、地方政府是这一利益张力格局的“始作俑者”。在“苟晶案”“外国人永久居住条例”等谣言案例中,对于苟晶、国内学生的道德声援,都在不同程度上夹杂着“政府牺牲公共利益”的消极性判读。在谣言互动实践中,这部分网民实现了消极情绪的共情与负面话语的和鸣,将散落于社会角落中的原子化诉求、愤懑,统合为强大的污名洪流。由此可见,“官方形象污化型”网络谣言,在一定意义上扮演着网民自发建构的非制度化“安全阀”<sup>②7</sup>,将结构紧张格局中民众经久积攒的负向情绪引流而出。

### 4.“政治阴谋论型”网络谣言:网络意识形态风险与民粹思维驱动

“政治阴谋论型”网络谣言,即激进、片面地将事件发生根源归结于政治因素的臆测信息。此类谣言往往产生于部分民众对于政策实践的过度解读,以及牵涉国别政治的话题之中,这在“延迟退休”<sup>②8</sup>“西方转基因食品”<sup>②9</sup>相关谣言中有所体现。在结构紧张视野下,此类谣言呈现出“网络意识形态风险—民粹思维驱动”的内在逻辑。

该类型网络谣言的生成,与转型期意识形态风险息息相关。在社会转型期,“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人们受各种思想观念影响的渠道明显增多、程度明显加深,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sup>③0</sup>。具备全民性、扁平性、匿名性特质的网络平台,与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等西方思潮强调的极端民主、自由之间,呈现出了天然亲和性。西方意识形态可能借助网络媒介渗入我国社会价值体系,通过侵蚀网络拟态环境,对国家意识形态造成权威性消融、话语权失语的风险。<sup>③1</sup>现阶段,民粹主义的泛滥便是我国网络意识形态风险的显性特征之一。<sup>③2</sup>这一思潮鼓吹平民大众对社会进行激进改革,“将极端平民化、大众化作为所有政治运动与政治制度合法性的最终来源”<sup>③3</sup>。网络民粹主义作

为脱胎于传统民粹主义的衍生物,强调“社会底层借助媒介技术赋权,以话语策略生产参与公共政策博弈的资本”<sup>③4</sup>。

在我国,当前网络民粹思维主要分为两个类别,并在不同情境下共同生产着“政治阴谋论型”谣言。其一,吸收转型期消极情绪所形成的网络批判现实主义。该思潮时常浮现于涉及底层利益、官方权力的话题情境中,通过鼓动失实的底层话语以对抗权威体系,构建出“阴谋的幻象”。如“北京大兴火灾事件”后,一些心怀怨怼的民众将政府部门清理违规经营行为及非法居住者的整治行动,谣传为“消除低端人口”<sup>③5</sup>。这与“延迟退休”谣言中,以“割韭菜”“剥削低端人口”来消减政府正面形象的言论类似。其二,聚合极端民族情绪所型构的网络民族主义。此类思潮往往伴生于国际政治摩擦的语境中,通过编造舆论无差别地抵制西方文化及产品,以爱国精神的正当性将暴力合理化。如“转基因食品系西方国家阴谋”谣言的扩散,便是一些网民在极端爱国主义掩饰下所发起的裹挟着极端民族情绪的话语暴力,由此释放对西方势力的怨怼抑或达成逐利目的。两类“阴谋论”谣言的肆意传播,实则是网络民粹主义于不同情境下的显性社会表征。随着此类极端思潮的广泛渗透,民众与精英的情感联结将产生流变,国家政治权威将受到侵蚀,公众善良积极的民族情怀也可能在盲目自信、消极爱国主义的扩张与操控中异化、消解。

5.“经验定式直推型”网络谣言:社会文化堕距与直观思维书写

“经验定式直推型”网络谣言,即根据日常生活经验而直观推导出的不准确认知。此类谣言一般发生于日常生活界面,关涉健康的“病毒防护”<sup>③6</sup>“养生知识”<sup>③7</sup>领域便是此类谣言的高发区。在结构紧张视角下,此类谣言来源于“社会文化堕距—直观思维书写”的生成机制。

我国部分民众的直观化思维主要来源于两个维度:其一,文化堕距的客观环境。经济产业等物质文化发展很快,精神文明等非物质文化则发展速度较缓,两者间逐渐形成了文化堕距。<sup>③8</sup>这种文化层面的结构失调,可能会影响公众综合文化素养的提升,科学化思维难以稳固形成。正如在互联网技术日新月异的同时,与之匹配的价值观引导、先进文化培植工作,却往往囿于制度实践滞后等因素而缺位,文化失

范、谣言弥散的窘境时有显露。缺乏科学规范指引的网络文化土壤,可能塑造出非理性的直观化思维惯习。其二,传统经验思维的代际传递。我国传统文化较为注重直观化社会体悟,这种扎根于文化土壤、受到世代传递的直观化思维,往往重经验思考而轻理性抽象,“在思维活动中时常将人的经验、感受、主张合理化地外推”<sup>③9</sup>,通过观象类比,由人及物地解释自然、社会现象。从一定程度上讲,这种经验化的直观思维,构成了部分民众过度解读社会事件、诱发谣言的基点。依托转型期的文化堕距环境,这种经验性直观推论惯习得以顺利、稳定地沿袭下来。

除此之外,日常生活场域自身固有的非批判性、经验化的倾向<sup>④0</sup>也同样值得关注。人们时常热衷于以过往日常经验来指导未知生活,这也构成了夯实民众经验性直观思维定式的另一重要变量。在上述因素的合力作用下,经验性直观思维及其诱生的谣言,在网络场域中具备着广阔的书写空间。如常态情境下,“夜里三点是人的排毒期”等广泛传递的养生伪科学,便是对于熬夜危害等日常经验、科学论断的不当解读。又如在非常态风险情境下,“空调杀毒”“绿豆防疫”荒诞猜想的频出,也是依据高温杀毒、绿豆清火等经验做出的直观推论与过度想象,更是对于传统中医与现代科学、经验主义文化与现代理性文化的杂糅性改写。这类谣言的频繁涌现,不但涉及文化因素,也从侧面反映了人们对于生命健康、生活质量的追寻以及风险冲击下“病急乱投医”的心理。

### 三、网络谣言的善治路径构想

在结构紧张视野下,对于网络谣言的有效治理,有赖于对信息沟通机制、消极情绪引导路径的密切关注。唯有从保障公共利益、培育国家与社会协作机制的善治思维出发<sup>④1</sup>,方能找到切实、有效的网络谣言治理路径。这样的网络谣言治理逻辑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维度。

1.聚焦线上线下情感疏导,应对“个体恐慌共享型”网络谣言

“个体恐慌共享型”网络谣言的弥散,源于高风险社会中的广泛个体焦虑,以及此类情绪的脱域性网络再生产。由于转型期风险往往难以迅速消解,在治理该类型谣言时,应当将对相关社会群体的情绪疏导视作靶标。

第一,设置制度化的线下情感疏导机制。街道及职能部门应当以购买服务等方式,在社区层面设立长效化、制度化的情感疏导等惠民服务机制。当风险发生后,尽可能地缓解相对弱势群体、流动人口所承受的失业等不确定性压力,展现政府部门积极作为的形象,消减其坠入严重焦虑、以传散谣言交互抚慰的可能性。

第二,建设补充性的线上情感辅导机制。线上情感疏导机制的建立,能够在拓宽惠民服务面积、降低治理成本的同时,对部分民众的情感动态、舆情走向做出测量与分析,发挥线下情感疏导机制的辅助作用。

第三,发掘网络社群的情感抚慰能力。培养话语领袖以维护网络社群中的积极话语环境,减缓社群成员所承受的现实压力,降低以传播谣言排解消极情绪的需求。

### 2.推动双向主体信息交互,瓦解“挑战权威话语型”网络谣言

“挑战权威话语型”网络谣言的泛滥,主要产生于自上而下的信息下沉梗阻,以及自下而上的民意表达不畅。因此,优化政务实践以推动双向主体的信息交互,从而增进政府正面形象及公信力,是瓦解此类谣言的核心所在。

第一,通畅政府主导下的民主意见表达渠道,引导民众参与基层民主监督。地方政府应发挥“从人民中来,到人民中去”的制度理念优势,增强民意整合能力,搭建个体、社会、国家间的沟通桥梁。比如尝试与互联网企业合作,构建政府主导下的线上民主协商机制,增强网络问政效能。

第二,维持信息下沉实践中的内容完整性、透明性。奥尔波特曾归纳出“谣言=(事件的)重要性×(事件的)模糊性”的公式<sup>⑩</sup>,信息内容模糊、完整度欠缺,有可能构成孕育谣言的基础条件。因此,政府机构在披露重要信息时,应兼顾其完整性、透明性与沟通有效性,避免信息不对称所引发的偏差性信息解读及谣传。

### 3.深化利益分配机制改革,化解“官方形象污化型”网络谣言

“官方形象污化型”网络谣言的矛盾核心,指向了转型期部分地域、领域的资源分配失调。因此,针对该类型谣言的治理重心,应瞄向既定的资源分配结构。在阶层、群体间利益矛盾显著化趋势下,如何

弥合结构性利益分配张力,提升民众“获得感”,是抚平民众相对剥夺心态、化解“官方形象污化型”网络谣言的重要基础。

第一,调试利益分配格局,促进分配结构的公平正义。比如通过规范收入分配秩序营造均衡利益分配格局,保障社会事业、基础公共服务的均衡发展以改善民生境况,完善对权力与资本监管的制度,缓解阶层间、群体间、地域间的利益冲突。

第二,强化社会保障的“兜底”作用。国家、社会对于弱势群体的照料能力,仍然有待从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发挥其“社会兜底”效能等维度进行提升,使弱势群体能够最大程度地共享经济社会的发展成果,在稳固民众“获得感”心态的本源性基础上善治网络谣言。

### 4.培育网民理性思维惯习,遏制“政治阴谋论型”网络谣言

“政治阴谋论型”网络谣言的形成原因,在于部分民众受网络民粹主义等非理性思潮鼓动,随意、不当地质疑国内外政治体制。治理此类谣言时,应当以培育网络理性思维惯习为主轴,釜底抽薪地对相关信息予以遏制。

第一,将先进文化下沉至日常生活界面。应当以贴近生活的日常逻辑、贴近群众的质朴话语,将马克思主义理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先进文化中的唯物主义立场、观点与方法渗透至基层社会。如在社区层面设置定期党课教程,社区党员共享党课体验活动等。

第二,孕育理性网络文化惯习。以贴合网络文化旨趣的方式,宣扬马克思主义等先进文化,积极引导我国网民走向理性思考,努力营造理性网络社会文化氛围。比如引导网络社群中意见领袖形成科学价值观,进而辐射其群体成员以实现网络圈群化社交场域的理性文化再生产。

### 5.调控网络舆论治理边界,延宕“经验定式直推型”网络谣言

与其他类型谣言不同,涉及养生或娱乐内容的经验定式直推型谣言,往往成为消遣性的舆论窗口。针对此类谣言,需要施以灵活性策略,在保障舆论自由边界的同时准确甄别风险,消减信息遮蔽引致的公众质疑与高昂的治理成本。

第一,以信息延宕策略治理养生性、娱乐性谣言。网络自身便是由多元化主体、多样化观点构成

的复杂场域,在信息交换、观点涨落中,网络空间的自净功能得以引导“伪科学”等经验知识,从杂乱、混淆走向有序、清晰。因此,采取静态的延宕思维对此类谣言予以“拖延”,能在节省治理成本的同时发挥“以静制动”的效能。

第二,以信息抑制方式介入舆论风险治理。在一些风险情境中,经验定式直推型谣言可能逾越其消遣功能边界,对民众健康生活秩序形成干扰,应当及时、有效地过滤风险信息,消减民众对消极信息的关注热度,避免谣言广泛传散。

#### 四、结语

当前在我国,网络谣言的产生源于现实结构张力与网络情境催化的共同作用。一旦突发事件、争议性案件浮现网络,潜藏于社会结构中的冗杂矛盾、消极情绪,往往在扁平化、脱域化的虚拟平台中得到整合,以生产或传递谣言的方式表达诉求、宣泄情感。因此,亟须通过疏导消极情绪、推动信息交互、培育理性惯习等策略,缓和结构性张力,有效化解各类型谣言,以疏代堵地维护社会、网络秩序的稳定。

此外,需要指出的是,网络谣言治理问题的研究不应止步于此。随着网民基数攀升、互动规模扩展,网络社会的主体性逐步凸显,网络日渐摆脱了其作为现实社会之投影的附属性地位。网络互动场域日益成为塑造认知的关键阵地,成为吉登斯提出的“生活政治”的实践场所,甚至反向型构着现实社会。同时,网络互动中繁杂的非理性情绪、偏差性误识,可能制造出“想象的风险”,并重新嵌入日常生活世界的朴素经验中,再次成为孕育谣言的土壤。因此,网络谣言与结构张力间可能存在着一条双向循环的互促渠道。随着现代风险频发、技术迅猛更迭,针对该问题的探索,对于如何保持网络社会与现实社会的良性互构而言具有重要意义。

#### 注释

①《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28—29页。②王倩、于风:《奥尔波特和波斯特曼谣言传播公式的改进及其验证:基于东北虎致游客伤亡事件的新浪微博谣言分析》,《国际新闻界》2017年第11期。③寇丽平:《突发事件中的谣言及其控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④[法]让-若埃尔·卡普费雷:《谣言:世界最古老的传媒》,郑若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5—16页。⑤周晓虹:《传播的畸变——对“SARS”传言的一种社会心理学分析》,《社会学

研究》2003年第6期。⑥李汉林、魏钦恭、张彦:《社会变迁过程中的结构紧张》,《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2期。⑦朱力:《变迁之痛:转型期的社会失范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79页。⑧孙丽:《网络谣言的类型与特征》,《电子政务》2015年第1期。⑨苏宏元、黄晓曦:《突发事件中网络谣言的传播机制——基于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当代传播》2018年第1期。⑩段忠贤:《网络谣言的生成机制及治理对策》,《贵州社会科学》2016年第4期。⑪唐雪梅、赖性强:《突发事件中政府对网络谣言的辟谣策略研究——以太伏中学事件为例》,《情报杂志》2018年第9期。⑫2020年3月11日,河南郑州人郭某鹏确诊新冠肺炎,此前其出于个人原因在3月1日至7日间罔顾国内防疫要求,多次往返于中欧多国之间,且在归国后未主动上报行踪信息。事件曝光后,大量网民于微博、微信等平台传递郭某鹏“密切接触四万人且现已死亡”等不实信息,旋即引发一定规模的网络恐慌。郭某鹏后被判刑,相关谣言得到有关部门澄清。参见任冠青:《你的情绪是不是被“朋友圈幻觉”利用了》,《中国青年报》2020年3月25日。⑬⑭[德]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张文杰等译,译林出版社,2017年,第27、47页。⑮王小章:《论焦虑——不确定性时代的一种基本社会心态》,《浙江学刊》2015年第1期。⑯王斌:《线上集体欢腾:理解青年网民集体行动的新视角》,《中国青年研究》2015年第10期。⑰[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现代晚期的自我与社会》,赵旭东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40页。⑱2021年5月9日,成都市第49中学学生林某坠亡于校内。在真相尚未查清前,“学校不让死者家属查看监控”“死者遗体被擅自火化”“学校下达封口令”等谣言不胫而走,引发大量网民口诛笔伐,数百名民众连夜赶赴事发现场讨要说法。随后该事件得到《人民日报》等媒体辟谣,涉事造谣者被相关部门处置。参见《还原成都49中学生坠亡事件》,《人民日报》2021年5月13日。⑲[美]孔飞力:《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陈兼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第300页。⑳上官酒瑞:《网络舆论生态治理的认识论分析》,《求实》2018年第6期。㉑2020年6月22日,“苟晶连续两年高考被冒名顶替”的新闻在报道后掀起网络舆论狂潮,事件当事人苟晶班主任以及山东教育部门被视为始作俑者。随后“苟晶班主任系山东教育厅官员亲戚”等消息在网络平台中迅速传散,相关机构随后澄清。参见《苟晶“被顶替事件”水落石出,网友:怎么和我预想的不一样?》,搜狐网,https://www.sohu.com/a/405594638\_120607247,2020年7月3日。㉒2020年3月12日,司法部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永久居留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截至2020年3月27日。一些社交媒体账号随即开始传播“国家鼓励女大学生和留学生联姻”等信息,得到大量关注。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随后发表严正声明。参见《杨宜勇辟谣:从未参加“外国人永久居留管理条例”起草工作》,搜狐网,https://www.sohu.com/a/377906364\_120044982,2020年3月5日。㉓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1页。㉔[德]拉尔夫·达仁道夫:《现代社会冲突——自由政治随感》,林荣远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47页。㉕[美]乔纳森·特纳:《社会学理论的结构》,邱泽奇等译,华夏出版社,2001年,第165页。㉖李培林:《中国贫富差距的心态影响和治理对策》,《江苏社会科学》2001年第3期。㉗[美]科塞:《社会冲突的功能》,孙立平等译,华

夏出版社,1989 年,第 33 页。⑳2021 年 3 月 12 日,国家有关部门提出按照“小步调整、弹性实施、分类推进、统筹兼顾”等原则逐步延迟法定退休年龄。“延迟退休是剥削低端人口”“延迟退休是为割韭菜”等曲解政策的不实信息得到迅速散播,虽然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专家随后进行细致解读,但这一消息仍造成广泛的社会影响。参见李长安:《延迟退休会增加就业压力吗》,《环球时报》2021 年 3 月 1 日。㉑近年来“美国转基因大豆导致不孕不育”“转基因大豆是美国对付中国的阴谋”等信息盛行于微博等舆论平台。袁隆平曾于 2015 年进行辟谣,此后诸多学者也对我国所进口的美国等西方国家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予以肯定。然而有关美国转基因食品安全性的谣言至今仍不绝于耳,类似谣言还包括近期盛传的“中国碘盐强化使用‘碘酸钾’是美国人的阴谋”等。参见万毅:《转基因食品:别用谩骂代替科学》,《中国食品报》2016 年 5 月 25 日。㉒《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出版社,2006 年,第 25 页。㉓李莹辉、安娜、毕颖:《网络拟态环境视阈下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实然风险与应然治理》,《青海社会科学》2018 年第 6 期。㉔据《人民论坛》社会思潮调查项目组资料显示,民粹主义曾于 2010—2014 年四次入选“最受关注社会思潮”,处于“十大思潮”第 4 位,并于 2017 年登顶。参见陈琳、单宁:《当前国内社会思潮趋势走向》,《人民论坛》2018 年第 6 期。㉕陶文昭:《互联网上的

民粹主义思潮》,《探索与争鸣》2009 年第 5 期。㉖何志武、宋炫霖:《话语赋权与资本博弈:公共政策场域的网络民粹主义》,《当代传播》2017 年第 3 期。㉗张灿灿:《大排查要推进还要避免误伤群众利益》,《检察日报》2017 年 11 月 27 日。㉘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空调温度 30 度以上杀灭病毒”“出门必须佩戴护目镜防疫”“淡盐水或熏醋杀灭病毒”等不切实际的防疫措施,在微博、微信群等网络舆论平台中广为传播。参见余清楚:《别让谣言跑在科学前面》,《人民日报》2020 年 1 月 28 日。㉙包括“茶叶抗癌”“食物相克论”等在内的养生伪科学,近年来虽持续被批评,然而“啤酒与海鲜共食导致痛风”“螃蟹不能与柿子一起吃”等失实论断仍旧风行于朋友圈等网络平台。参见林秀红:《关于螃蟹的流言 几分真假?》,《健康报》2020 年 12 月 10 日。㉚[美]威廉·奥格本:《社会变迁——关于文化和先天的本质》,王晓毅、陈育国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 年,第 106 页。㉛张传新:《非典流言流传的根源与启示》,《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 年第 6 期。㉜姚登权:《从日常生活图式看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6 年第 3 期。㉝俞可平:《治理和善治引论》,《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9 年第 5 期。㉞[美]奥尔波特:《谣言心理学》,刘水平等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 年,第 94 页。

责任编辑:沐紫

## Structural Tension and Situational Induction: Generation and Governance of Network Rumors

Zang Guangli Zhao Shiyu Wang Bocheng

**Abstract:** As a special form of public opinion, network rumor is not an accidental flow of false information, but actually an aggregation and presentation of structural tension in the changing social struc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ology, the network rumors in the context of China's transition period actually contain the generating mechanism of "structural tension — situational induction": the network rumors in the situation of risk society constitute a tool for certain people to meet the needs of regional unity and relieve anxiety; under the situation of poor information exchange, the network rumor acts as a social tool to realize malformed information breakout; the network rumor in the pattern of interest tension acts as an important outlet to release negative social mentality; the essence of the network rumors under the condition of the disorder of network ideology is the display of extreme behavior driven by populist thinking; the network rumors under the condition of cultural lag are actually the daily thinking picture sketched by the habitus of intuitionistic empiricism. To reduce the negative effect and order of network rumors, it is urgent to start from the good governance thinking, build a bridge of governance between the state and society facing network rumors, and connect the tension structure between "the state, society and individuals" into an organic system of tacit cooperation.

**Key words:** network rumors; structural tension; formation mechanism; social governance